

## 东亚经济合作需要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人

亚洲有49个国家和地区,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一体化的组织。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和欧洲、北美的经济区域化日趋深入,如何积极发展亚洲区域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是摆在亚洲各国和地区面前的一道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如何?和欧洲及北美洲相比,东亚经济合作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面临哪些障碍?如何处理与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关系?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人教授,陆教授进行了详细解析。

### 东亚经济合作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记者: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不可阻挡,您认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什么,现状如何?

陆建人: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首先得回顾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早在1992年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倡议,其成员就是今天的东亚13国。此倡议一出台便遭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不满,他们似乎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全部由黄种人组成的经济集团。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深切感受到没有区域合作机制之苦。在此背景下,同年12月15日,在马来西亚首次实现东盟9国(当时柬埔寨尚未正式加入东盟)与中、日、韩3国首脑的会晤,迈开了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建设的第一步。

1999年11月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在东亚地区合作的原则、方向、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这可以视为10+3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之后,10+3合作框架的执行机制逐渐明朗化。

10+3框架不仅有执行机制,而且有长远目标,这就是由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东亚共同体”不仅仅包括经济领域,还包括安全和社会文化方面。

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东盟与日本的合作也出现了突破。双方在会上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确定2017年前建成“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

在2004年11月于老挝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韩国同东盟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东盟同中国的关系也明显得到加强。会上还讨论了建立“东亚峰会”机制和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日本表示愿意在2005年主办有关国家外长会议,讨论“东亚峰会”的概念和形态。会议决定首次“东亚峰会”由马来西亚于2005年主办。

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10+3合作框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南南型与南北型合作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合作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推进东亚合作蓬勃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陆建人：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因主要是：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自由化困难重重，而地区贸易自由化则相对容易；欧洲和北美的经济整合使东亚在心理上产生被排斥的感觉。内因则主要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深刻；日益增强的区域内经济联系；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的横向联系。

东亚的经济重心不在东南亚，而是在东北亚

记者：从历史来看，东盟似乎是东亚合作的基础推动力量，您如何看待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

陆建人：东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南南型的合作，它具有一系列天生的缺陷，效果有限。因此东盟非常希望有发达国家加入合作，进而可以形成对其有利的南北型合作。

东亚的经济重心不在东南亚，而是在东北亚。中、日、韩3国的GDP总和约占东亚13国的90%多，东盟10国GDP总和尚不足东亚的10%，显然，东盟自身的分量是很有限的，必须借助中、日、韩3国的合作，东盟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东盟的经济分量虽轻，但却是推动东亚合作的最积极的力量。10+3框架形成后，东盟一直以主人的身份召集会议，而中、日、韩则是以客人的身份与会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小国领导大国”的现象。

中日韩三国都有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需求和动机，当然，也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意识到本国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国内市场有限，因此其经济发展的构思源于以下两点：第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以世界市场为舞台的国际经济活动；第二，国家的竞争力以地区竞争力为基础。为此，韩国政府对于东亚合作一直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韩国的作用也非常重要。韩国位于世界经济第二大日本和正逐渐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之间，是一个连接大陆和海洋的桥梁，而韩国由于是一个小国，无法在东亚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它可以发挥其在区位上和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对两个大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起到一种积极的协调和推动作用。

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需求在于：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无疑可以从东亚区域合作这种南北型的合作中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其次，中国之所以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不是为了控制东亚，称王称霸，而是为了东亚的兴旺发展。

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从而避免了东亚第二次货币危机的爆发。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也为参与东亚合作的各方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对于包括东亚合作在内的地区性合作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而是强调WTO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改变了态度，面对迅速扩散的危机，日本意识到自身和东亚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从没有协议的经济一体化转向有一定框架的经济一体化，才能保障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才能保障日本的利益。

亚洲金融危机却让日本得到了一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日本启动名为“新宫泽构想”的货币援助计划，对损失惨重的东亚国家进行救助，这多少有利于消除东亚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冷漠态度也使东亚国家进一步向日本靠近，而日本也将东亚国家这种观念的转变视为自己可以倡导地区性框架的信号。

日本发挥的作用在于：首先，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向遭受危机的东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有人称之为日本的“亚洲马歇尔计划”。日本试图通过此举逐渐在东亚争得领导者的地位。

其次，1999年11月，日本与东盟国家签订有关协议，同意向危机国家提供优惠贷款。这表明在日本的推动下，“亚洲货币基金”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悄悄成为现实，显示了日本政府要

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

第三，加强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与扩张。日本试图通过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确立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国地位，主要方式是资金输入和经济援助。

因地制宜，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记者：东亚经济合作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哪些影响？

陆建人：从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来看，中国是一个经济规模迅速提升的发展中大国，其国内市场极为庞大，并且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层次结构。中国的局部产业和局部地区处在相对发达的水平，这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形态呈现出二元结构的特征，即总体上是南南合作，而在局部上在是南北合作，这就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由于中国和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太容易得到深化。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给东盟成员国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且自那以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有着13亿人口的潜在市场，而东盟则有着5亿人口的潜在市场，其总体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中国东盟的合作将对整个东亚经济未来的成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分析东盟与日本之间的合作，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典型的南北型合作，东盟各国从垂直分工中获得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利益，而日本则从东盟巨大的市场中获得了好处。

日本同东盟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其经济发展。日本与东盟的这些合作，无疑将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效果将在今后10至15年中逐渐体现出来。

再看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合作，东北亚是东亚经济的重心。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91.2%，其中，中、日两国占了东亚的84.5%。很显然，东亚合作应当以中、日为核心，正如欧盟以德法为核心那样。如果中日能够加强合作，将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日之间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南北型合作的特点。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日本的优势主要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而中国的优势则在于它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劳动力。

从上可以看出，东亚经济合作存在如下两种类型。南南型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一般来说，南南型合作基本上不具备成功的条件，其主要表现在：（1）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吸纳其他成员国的商品；（2）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3）南南型合作的一体化政策难以协调；（4）南南型合作中存在严重的贸易转向效应。

南北型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区域合作之后，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的方式而完成其工业化过程。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富裕的邻国形成区域合作似乎要远远优于南南之间的一体化。

东亚合作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从1997年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合作过程中，各国的作用和动机不尽相同。当今多边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而地区合作已经成为多边合作的一种重要补充，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南南型和南北型合作混合体的东亚经济合作将对东亚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也只有在10+3框架的各方共同积极参与下，才能出现东亚合作更为美好的局面，从而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记者：有人认为，东亚的政治、经济、历史背景迥异，很难像欧盟一样融合、一体化？

陆建人：实现区域一体化应该说是各国之间的差别越小就越容易联合，差别越大就越不

容易联合。“欧洲共同体”(EC)从最初建立的“煤钢共同体”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不但早就建成了共同市场,而且还使用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原来的欧共体已发展为今天的“欧盟”(EU),已不仅仅是经济共同体了,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高度融合的“超国家”集体了。东亚要“共同”到像欧盟这样高的程度恐怕很难做到。

从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东亚各国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亚洲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也很大。目前只有日本属于经济发达体。此外,东亚人口众多,分布分散。从现实出发,不妨把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定得低一点。这方面,可以向讲究实际的东盟学习。

东盟(ASEAN)在2003年提出了在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作为“东盟共同体”三个支柱之一的“东盟经济共同体”,是以建立“东盟单一市场”(ASEAN single market)为最终目标的。而“单一市场”不过是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初级阶段。东盟把“经济共同体”的标准定在初级阶段,体现了务实的精神。

从近期看,大约10-15年内,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从中期看,大约20-30年,有望实现东亚成员的经济一体化,建立共同市场,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通。东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应是东亚地区的所有主权国家。目前为10+3,而朝鲜、蒙古这两个东亚国家都没有加入到自1997年开始的东亚合作进程(10+3框架)中来,不是10+3的成员。不过,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加入这一框架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更高的目标,如货币一体化,统一使用“亚元”,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998年,即10+3框架搭建后的次年,韩国总统金大中便提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来研究东亚中长期合作,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各方面合作的规划。在2000年的10+3会议上,新加坡也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2001年,展望小组提出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10+3合作的长期目标。2002年该小组再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并得到当年的领导人会议的赞同。2003年底,日本与东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在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中也明确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记者:一体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陆建人:一体化的发展有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最低阶段,就是建立特惠贸易区,即特惠贸易区内的国家之间不是对所有产品,而是只针对几种产品,譬如录音机或汽车实行特别优惠的关税;第二阶段是建立自由贸易区,即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之间对所有的产品都实行减免关税;第三阶段是建立关税同盟,即同盟内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对所有非成员国实行统一的关税;第四个阶段是建立共同市场。在这个阶段中,会有一个所有成员国必须遵循的制度。一般来讲,一体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大半。当然,在自由贸易区产生的阶段,我们也可以说一体化的初级目标已经达到。

一体化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是实现货币一体化。在这个阶段,区域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由中央银行制定的,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制定的。像欧盟,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由欧洲银行制定。到这个时候,国家的主权已经没有了,各个国家是通过让渡国家的主权来获得地区的利益。一体化的最高阶段是政治上也完全一致,就是马克思讲的国家消失了。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大国,只有一个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个阶段,并正在向第六个阶段迈进。上世纪末,欧洲实行了统一的货币——欧元,现在欧洲正在搞议会制,然后选举出一个议会主席来协调外交政策。现在欧洲人的国家意识已经非常淡漠。

东亚经济合作面临的障碍

记者:您认为实现东亚区域一体化面临哪些障碍?

陆建人：温家宝总理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中讲到，维护和平与稳定是实现亚洲共赢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谈不上发展。另外就是每个国家都要对区域合作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完全从自己的民族或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也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欧洲当初在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如果不做些妥协和让步，就不会有今天的强大。此外就是亚洲的多样性，多样性本身有它的好处，有了多样性，互补性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多样性有的时候确实会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当前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最大的政治障碍是日本屡屡挑起中日摩擦。自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日首脑互访已经中止。小泉对参拜靖国神社没有丝毫的悔意，老问题一个都没解决好，此外还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处境不是期待其有所改善，而是防止其进一步恶化。这种状况对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十分不利。日本若不能正视历史，东亚经济共同体也好，东亚共同体也好，都很难搞成功。而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互信。为此，中、日双方都要作出最大的努力。双方应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理性态度来处理相互关系。

记者：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正在从环大西洋地区转向亚太地区，显然，美国不会坐视东亚经济一体化。如何处理东亚经济共同体与美国的关系？

陆建人：东亚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冷战结束初期，随着美军撤离菲律宾，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有所收缩，但美国仍继续保持其军事存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大利益是安全利益，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东北亚，东南亚可以起后备基地的作用。为此，美国要控制这一地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一个亚太大国在东南亚发挥主导性作用。南中国海是美国从中东运输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包括武器）的重要通道，美国要确保这里不发生军事冲突，以免影响其每年数以千计的船只和军舰通过。美国失去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后，一直在寻找替代办法，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除了安全利益外，美国在东南亚也有较大的经济利益。东南亚是美国重要的海外市场和投资场所。目前，美国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重要投资国。美国还在印尼的油、气资源上有巨额投资。此外，东盟是美国重要的军火市场之一。亚洲金融危机前，新、马、泰等国争相从美国采购战斗机现代化武器装备。此外，向东盟推行西方价值观，鼓励“民主”制度也是美国卷入东南亚事务的动机之一，这属于政治利益。

美国在东亚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利益和影响。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适当考虑美国的利益，如采取一定措施，减少贸易转移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实行某种程度的税率优惠等等，以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此外，要继续积极鼓励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投资。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中国信息报记者鄢来雄

（发表于《中国信息报》 2005年11月16日）